

· 民族传统体育 ·

武术竞技化过程中的观念变化

吕继光¹, 陈英¹, 曹守诤², 赵海军³

(1. 河北体育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1; 2. 河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1;
3. 石家庄经济学院 公体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试从武术发展的客观存在中, 找出理性认识的因素, 为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发展, 提供有益理论参考。

关键词 武术; 武术竞技化;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85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2)02-0047-06

Changes on the conception of Wushu in the process of emulation

Lü Ji-guang¹, CHEN Ying¹, CAO Shou-he², ZHAO Hai-jun³

(1. Hebei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ijiazhuang 050041, China;
2.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1, China;
3.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ijiazhuang Economic College,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wushu based on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oteric conception could not reveal and solve a lot of problems which prevent wushu from well-balanced developing. This paper finds out some factors of rational cognition from realistic existence, and provides helpful academic reference for well-balanced developing of wushu and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Wushu; Wushu sports; concept of value

1 近代体育观形成的背景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我国对武术认识转变,是在近代体育的传入和刺激下,促进中国本位体育观的逐渐形成而变化的。体育观的形成,又是伴随中国逐渐摆脱和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压迫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探索和建设国富民强道路的整个历程,逐渐形成和成熟的。

从严复诠释的“物竞天择”,以强种来救国的教育思想开始,启发了近代体育观的觉醒,到完全抄袭日美体育,到认为“体操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再到“马氏体操”,再到“实质体育”与“自然体育”并行,就是由北洋军阀统治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近代体育探索实践的历程,也是竞技体育观、竞技武术观形成的过程。

近代体育的传入,是从“东洋体育”的引进,到被“西洋体育”强行输入而取代开始的。而东、西洋体育的输入又是配合其输入国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协同而来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宣告了对待外来思想文化采取“中体西用”策略的彻底失败。(李泽厚语)但此时变法领袖在民众中的影响却如日中天,严复的“物竞天择”的教育救国思想逐渐被青年学生接受。再则,随康梁东走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东洋”日本寻求救亡强国的良策,留学日本成了当时的一种潮流。体育界包括徐一冰、蒋维乔等一些人深受其影响。随之,留日学生带回来了“军国民体育”,用“全民军事化尚武精神”诠释表现“物竞天择”“自强保种”“动”以救国的道理,便在新式学堂中展开。

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一文赞叹日本的“军国民精神”所说:“日……近且汲汲于体育之事务。使国民皆具军人之本领,皆蓄军人之精神。彼日本……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尚武被梁启超认为是日本军事强盛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中国的“土体育”武术也被梁启超重新发现:

“曩见日本有所谓柔术者,颇为彼国人民所崇尚。就而观之,以为近于中国江湖卖解,未为奇也。而彼国之人,乃尊之为武士道,视为生人不可缺之学科。自乙未后,彼国人民来游中土者日多,足迹遍于里奥。……世之议者,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

在此形势下,首先,我国各类新兴学校,均开设日德军操,这种体操就是后来我们认为的体育。但是,一经引入,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被侵略者学习侵略者的强国之道。难以把握民族自尊的尺度。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体操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因此,体操也必须“教子弟以礼让之大本也。”(王维泰《体操说》1897)即“西用”必须为巩固封建专制的仁义道德的“中体”服务。

这种“中体西用”的观点表明,洋体操与我国传统体育,如武术的形式、功能、作用等没有质的区别。认为“体操”等西方近代体育“实在是我国传统养生术的余绪”。尽管如此,还有人担心“自兴学以来,体育之科,步趋随人,礼失而术诸野,道失而学在夷。”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当初在接受近代体育时,仍以“中央帝国”的心态,以“中体西用”的方式来接受的,仍存有被夷化的疑虑。可是,以这种消极被动的疑虑防范,很快在帝国主义列强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面前束手就擒。

著名学者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揭露东、西方帝国主义向我国输入近代体育侵略我国的目的。随着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结束,美国在欧战中获得暴利,经济迅速强大。“已准备凭借优越的金融势力侵入中国,和日本决一高下,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口号反对日本独吞。为了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加大了其侵略输入。在我国,1919年4月,杜威来华借宣扬‘民主、科学’的实证主义学说,以配合美政府在中国学界培植反日亲美情感。”

国际上,在巴黎和会及在此之前的新四国银行团会议、之后的华盛顿军缩会议上美国均把讨好中国当成要挟日本的筹码。因此,博得了一些中国人的好感和幻想。如“巴黎和会”、“军缩会议”都是在美国主持下举行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抱着天真的幻想,以为这回列强会根据“正义”而把独立自由“交还”给中国。(第164页)……以为美国这回真是大大帮助中国了……(179—180页)

于是国内学界有些人蒙蔽于美国的这种伪善政策,附和美国的,废除由日本传入的“军国民体育”,主张引进美国的“自然体育”。张宝琛1920年在《学校应否废止兵操》一文中揭露的正是国内体育界被美国这种殖民侵略阴谋所蒙蔽的事实:

“乃近来一般神经过敏之徒,鉴于德奥之失败,协约国之胜利,于和会开幕之初期,沾沾自喜,曰,公理战胜强权,军国主义扑灭,从兹国际战争消灭,世界大同可期矣。吾国学校之兵式教练,可以废止矣。……此由过信杜威博士之学说,致有此种不健全之德莫克拉西的教育主义发生也。……然

则欧人所倡导之人道主义者,乃强国对于强国之人道主义,非对于人类全体之人道主义也。……威尔逊光明磊落之心情,有声有色之主张,世界弱小国,莫不尊之曰:‘正义之神’。曾几何时,事与愿违!^[1]因此,胡绳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骗局。”^[2]

尽管是美国的欺骗手段,并没有影响中国学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亲美友善思绪的发展。此时,日本的“军国民体育”的兵操无论如何也不合时宜了。于是,国内废止兵操,提倡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已成大势所趋。可以说,此时美国取日本以代之,引导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潮。

“从此我国学校教育(包括体育)由过去的抄袭日本,转而仿效美国,这种状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没有改变。”^[3]可见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受殖民者侵略影响是深远的。

由日美两国的经济、文化侵略之争,引发了我国学界东西洋体育之争。之后,以西洋体育取代半殖民统治中国的主导地位而告终,但从此也刺激了对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反思,建立民族本位体育意识的觉醒。它引起了人们对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视和比较。提倡发展中国固有武术的理念就是基于此产生的。

“但提倡者大多未摆脱传统功利观念的影响,……认为西方近代体育只不过是传统体育的余绪”。更确切地说,由于西方文化,是以强盗的行为强行进入中国的。而不是中国主动吸收引进。这样一来,一个被侵略的落后民族,不得不千方百计考虑怎样才能保持住自己固有的本体观念思想。因此,包括对传统体育文化在内,只进行与西方近代体育“形似”的改造,成了当时环境下不得不为之的事实。但却因此模糊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的(本质)差别。客观上“严重影响到对传统体育的整体把握,导致(以后)对传统体育的认识仅停留于具体方式的研究,而从未能从整体上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反思。”^[3]造成这种认识上的缺陷。这种观点形成以后,直到今天仍在影响、困扰着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发展,使之停留在技术层、制度层面上的研究,从未在武术观念层次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拓展。

在对我国体育方式道路的反思过程中,又产生了“土洋体育之争”。随之,坚持中国应发展土体育的人士,从传统体育中整理出如“八段锦体操”、“静坐法”、“六段运动”、“中华新武术”等这些传统养生方式,进行提倡传播。很明显,这些传统体育方式既坚持着固有本质,又受到近代体育的形式影响。是“中体西用”早期影响的结果。相比较而言,“静坐法”趋于传统养生术的静功,“六段运动”则趋于传统养生术的动功,而“中华新武术”更接近当时的“洋操”。但始终没能超越“中体西用”的观念范围。

尽管“在‘静坐’原理的阐释上,使用了近代科技成果,并力图从健身防病的角度发掘它的体育意义,但是,他们对‘静坐’的基本理解,依旧立足于封建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思想基础之上的。”^[3]而毛泽东的体育观此时也只停留在传统养生观上;“体育者,养生之道也,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养乎吾生,乐乎吾心……”^[4]停留在对中庸思想的继承之中。

这对以后的中国体育,尤其民族体育影响很大。

以上资料分析可见,近代以来民族本位体育的构建仍深受“中体西用”洋务思想影响。之后中国的民族本位体育观的形成,也深受华夏祖制是正宗,是标准不能变更等顽固思想原则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至今都在起着作用。当代武术发展模式就是“中体西用”思想影响的结果。所谓的“中体”就是坚持武术文化深层的观念不变;“西用”就是引进了体操、拳击技术层次、制度层次的形式和规则。而这两种形式及所有奥运项目背后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精神,以实力论成败的价值观念,却在武术竞赛中难以体现。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的肤浅武术观,长期指导中国的武术发展、改革,这只能是从形式上沿袭西方体操。编造中国式体操,并认为这是完善的“竞技模式”。

“土洋体育之争”后,徐一冰等人也认为洋体育是形式体育,而“土体育”才是实质体育。认为“学校体育”皆袭他人之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当时有一篇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的文章认为:“实质体育之目的本不专在改良形体,还得兼顾其实用价值。”“无事则为强健之劳动者,有事则为强健之军人斯”^[6]主张从民族体育中选择拳术、击剑等具有武艺效果的运动方式。并且认为:“拳艺者,体育之最上乘也。”“如果我们能发扬光大之,中国则能与众夷洋相抗衡”。把提倡武术抬高到“强国强种”谋求国家富强的地位,想以此阻止所谓美国自然体育的侵入。这是又一次拿起“中体西用”的策略对付美国体育的入侵。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自然体育思潮的汹涌澎湃,学校武术教学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武术观念却从“致用技击”,旨在“自强保种”体育思想中,改头换面成自然体育的“卫生之道”。于是,武术从实用技击,转向了修心养性,强调道德的修养理念的老路上。从此,体育的作用旨在修心养性的“中体”文化观念,在讲究“卫生之道”的自然体育新形式庇护下寄生延续了。这样一来,严复等人宣扬的“物竞天择”“自强保种”促使中华民族真正觉醒、崛起的体育思想,在日美等国抑制和侵略目的下给抑制住了。杜威的理论在中国学术教育界取代了严复的思想。而杜威的理论在当时无论如何先进,也是在美国侵略中国时进入中国的。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2 封建旧思想再一次侵蚀了“国术”改革的初衷

1932年,通过张之江几年的奔走呼吁,积极投身提倡国术运动及实践,推动了对武术的进一步认识:“国术原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技能,一方面可作为锻炼体格之工具。”^[5]这一认识,尽管带有感性认识的印记,但它是我国第一次把传统武术“打练合一”的实践认识,反映在武术概念中。它的形成,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难能可贵。它既没有因当时以健身为旗帜提倡西洋体育而否定武术的“自卫技能”,也没有因肯定它的“自卫技能”而忽略其健身作用。这一基本认识,完全是站在“国性不可忘,国情不可不知”民族本位立场上形成提出的,是继“中华新武术”之

后的理性认识的发展,是“各拳种进步注重锻炼效果,强调练功、练气”认识的体现。这是张之江先生总结了近代以来“物竞天择”“动”以救国、强国思想的结果。它是继承孙中山“尚武精神”、“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坚定“无论是个人、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己的能力,才能生存”^[6]革命先驱强国信念的直接表现。他创办了“中央国术馆”,把“强国强种”的夙愿付诸实践。他说:“盖强国之本,在于强种,强种之本,在于强身,而强身之本,要以国术为唯一。”^[7]这是他努力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中提取出“强种强国”进取因素的积极实践体现。

最近台湾著名学者徐元民教授也认为:“国术考试中之拳械比赛为张之江之主张,在奖劝优劣,在养成任侠勇敢临敌不慑之胆气”。“张氏认为二十世纪的舞台,有着‘不竞争则不能生存’哲学。”……乃主张尚武以提升国民个个成为壮士,是为中央国术之使命,须“奋武”“讲武”“竞武”,国家才有希望。热血沸腾的张之江,又为军事将领出身,岂有坐视国家遭帝国主义者凌虐之理,职是之故,张氏将普及国术与国民革命相提并论,认为国术可以强健全民体格,促进民族强盛。^[8]

从以上资料中我们也体会到,张之江要用国术铸造中华民族竞争进取向上精神,振兴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他破除了武术借鉴竞技体育非要有“体用”之别的观念习俗。为此他在1928年、1933年两次国术考试中,都把这种新理念付诸实践。

这种尝试的初衷就在于:用攻防格斗的竞技功夫,来衡量武术运动成绩水平的高低。努力使武术传统的技击价值,通过近代竞技运动形式及其成绩优劣表现出来。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尝试,是中国武术向近代体育转变的一大创举和进步,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既保持了武术各地各家之拳术能打敌制胜则一也”的传统价值标准,与竞技运动追求成绩优劣的价值标准的一致性。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武术内容与形式的完整和统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武术改革朝现代竞技运动发展的良好开端,是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术改革的历史功绩所在。与“中华新武术”相比,它把武术改革由技术的表层推进到制度的深层,同时也促使了武术观念的更新。

但是,由于军阀借款打内战,社会条件的不允许;由于强大的封建习惯势力影响;由于具体准备工作不足,特别是理论上没有形成自觉明确的共同认识,裁判工作欠严密公正,造成比赛结果不如人意,出现运动员打的“头破血流,折筋断骨”现象。因此,这次武术改革没能及时上升到理性的自觉加以概括总结。到1933年第二次国术比赛时,由于没有解决好以上问题,使得双方不敢轻易进攻,只得在台上躲闪逃避,比不出真正的水平。比赛场上的这种状况,客观上强化了散手是“好勇斗狠”偏见的形成,从而又强化了武术朝着“自然体育观(中国化的西洋体育观)方向发展的主观认识的形成。它动摇了通过直接对抗竞技取得成绩价值标准实施的初衷。从此,把中国武术的体育竞技化转变拖向了形式

与内容实质分离的岔路上。

后来,由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反二战情绪日趋强烈,提倡武术的搏击竞技就是提倡攻击性、提倡竞争打击。这种攻击性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强权,军事上就是侵略。因此,再提倡国术竞技已不合时宜。所以,社会思潮开始出现矫枉过正,走向彻底否定“国术”竞技改革的另一极端。1932年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开设的课程,则看出“以开展套路促进国民健康”这种生物体育观的主导作用倾向。因此,使张之江千辛万苦努力,刚刚兴起的具有自强“尚武”的国术竞技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相继爆发,武器的批判取代了批判的武器。因此,对传统文化中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实践与探索被迫中断。

3 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仔细研究继承“国术”改革的经验

由于“国术”改革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进行的,而且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仔细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武术改革。所以,对建国后的武术发展基本没有影响。

当时的运动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武术家,仍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民族形式体育就更被摧残”的认识评判张之江的国术改革。把竞技尚武仅看成是“好勇斗狠”,而认识不到它是用攻防格斗的竞技功夫,来衡量武术运动成绩水平的高低,是努力实现武术传统的技击价值与近代体育竞赛形式相统一的这种现代探索的重大意义。并且仍以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只是形式的差异,没有质的差别,坚持“中体西用”的观点来发展建国以后的武术。这影响了对武术的基本认识、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建立,影响了当代武术观偏向于生物武术观^①方向的发展。认为健身性是武术的本质功能和最终目的。

4 1954年对武术理性认识刚刚开始却又被“大跃进”“文革”所摧残

在1959年第一部武术规则颁布之前,对武术的继承发展有过一次被人们和史界忽略的重要争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1953年在全国民族形式体育大会上讲话强调“要遵循武术自身规律,科学全面地继承传统,是武术创新的基础、发展方向。”^[9]会后《新体育》杂志发表社论“把民族形式体育引向更健康的、人民的道路”(《新体育》1953年第4期)却说“如何使民族形式体育更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对立优美的形象,就是今后民族形式体育的发展方向”。在如何创新问题上与贺龙主任的讲话有以下不同:贺龙强调发展武术要尊重武术自身规律、尊重科学。这样一来,就势必先向专家学者请教。为此,《社论》抱怨贺龙讲话只注重专家、不重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所以它要“把民族形式体育引向更健康的、人民的道路”。这偏离了国家体委先研究实验,后推广普及,服务于人民身体健康的思路。并在如何继承发展的问题上对会上“西南区选手蓝来贞表演的‘绵拳’

和‘自然剑’对锻炼四肢、关节和内脏,都有很好的价值,而且在姿态上,更有体操和舞蹈的一些优点。这种刻苦钻研、采集精华、‘推陈出新’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对待民族形式体育的正确态度”给予充分肯定。这种态度直接导致日后武术的创新体操化倾向出现。

为此,新中国第一代具体负责武术工作的领导人张轸,1954年在全国范围内,对几个武术开展较好的大中城市进行了具体调研。概括成《关于整理和开展武术运动的几个问题》^[10]的报告,全文从5个方面阐述了新中国武术服务的对象和目的,就是为增强人民体质,让“人民喜爱”。并且重申推广武术,服务于人民,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调查研究,发掘整理,广泛宣传,逐步发展。在实践的基础上整理,在整理的原则下推广,整理与推广相结合,这是符合中央体委‘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并逐步使之普及与经常化’方针精神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贺龙讲话的具体化。这一发展方向和计划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符合事物发展科学规律的。

可是,由于随后的政治形势的“大跃进”,谁再循序渐进,谁就是右倾保守,右派就是反革命。这骤然的变化,使武术出现全国各地一刀切,同练“体操化、舞蹈化”单一长拳套路的局面。对武术的理性认识还没来得及实践,就被政治的暴风骤雨给淹没摧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使封建思想的糟粕泛滥成灾,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被政治野心家发挥到极致。套路竞技化的改造及其竞技形式的形成发展,就是在这种左倾社会思潮背景影响下快速进行的。

从1954年张轸的《关于整理和开展武术运动的几个问题》到1957年“鸣放”与反右之前《新体育》由蔡龙云在1957年第2期发表《我对武术的看法》一文,引出了武术的讨论与争鸣。蔡先生认为武术自有它的“击”“舞”两形式规律;在今天的整理、研究和发展的工作中,应该让它本着自己的规律和基础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向前继续发展!他并且认为时代需要扬舞抑击。他的依据是,既然“任务在于‘增强人民体质’,要否定它的‘花’,就看‘花’是不是能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击”;“仅保留它的运动特点”就行了。作者把“增强人民体质”当成继承民族传统武术最终目的,因此,他肯定了武术套路形式向体操方向“花”的倾向。

这正是未摆脱传统功利观念的影响,否定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间存在本质差别,坚持“中体西用”认识模式,导致对武术的认识“仅停留于具体方式的研究”“错误思想观念的继续。随后,吴高明《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与蔡商榷》(1957年第4期)、徐哲东《略论武术的性质》(1957年第13期)、马辉《武术要保存民族形式固有的风格》(1957年14期)等著名人士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反对蔡龙云的观点。到1957年8月,这种学术观点的分歧变成了政治分水岭。吴高明等人提倡武术的技击性被定为“唯技击论”;“唯技击论”是把武术引向错误的道路,必须批判”。

政治上,毛伯浩在1957年16期《新体育》上反驳“是‘一棍子打死’吗?”指责董守义、张轸、吴高明等人是“恶毒攻击

党的右派分子”。这不仅否定了张、吴的武术观,而且也终止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和工作权力。这种否定很快就反映出来,武术按着“舞”的形式规律和仅保留“击”的运动特点的发展观,成了竞赛规则的指导思想。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毛伯浩任秘书,取张轸而代之。董、张、吴等人被解职受到批判。同年,颁布了《武术竞赛规则》,从此武术就朝着“舞”的方向发展下去。带着“比赛内容单一,吸收了一些体操和舞蹈的动作”,^[9]只表现技击含义的弊端,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这都是时代留给历史的烙印。

文化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也因武术采取“中体西用”应对方式,以套路表面竞技化的发展得以隐蔽性延续,并在技术层面上争论不休。如20世纪70年代,由于过分强调套路动作的非武术化,导致“跳跃、翻腾这些非技击性动作进一步发展,把武术的‘难度动作’实际上限制在跳跃、翻腾、平衡这样比较狭小的范围内”。虽然1977年在规则中取消该条规定,但当时并未因此、也不可能“在武术技术发展方向的问题上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11]即武术从未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制度层、观念层的深刻反思扬弃。也因此至今“套路固执己见”,^[9]至今仍“墨守成规,畏首畏脚,导致无论是竞技武术还是传统武术都突不破我们自己观念里的框框”。^[12]因此,武术界至今也很难形成较为深刻理性的统一认识,形成健康的武术观,来指导实践。

20世纪50~60年代,尽管武术是民族传统体育,但在朝竞技化转变过程中,也受到前苏联体育模式(把竞技运动、学校体育、社会健身活动统称体育,而且靠国家行政拨款来开展)的深刻影响。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竞技运动,因而武术在此期间也争相建立专业运动队,走竞技化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国家的行政拨款,受到国家的重视,吃上“运动灶”。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对武术(传统体育)进行深刻的反思,人们对武术竞技的认识仍是非常肤浅的,所以武术的竞技形式只能沿“中体西用”老框框走,使形式上一味地模仿竞技体操,向其靠近,成为必然。因此这一时期武术只有套路唯一的竞技形式发展。

5 左倾思想的泛滥,彻底打断了理性认识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提倡“健身性”,反对“锦标主义”的竞技性,且把二者对立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制定武术规则,对传统套路开始进行改造:规则借鉴了竞技体操的规则形式,在基本技术上大量吸收了京剧武打动作。如旋子、旋风脚、翻腰、行步、舞花、滚翻等内容,还“杜撰了大量的武术‘技击含义’的动作”,^[13]使套路技术朝着旨在提高“舞”的表演效果的“高、难、美”方面发展下去。这种单一“舞的方面”的移植和杜撰,看似动作没有什么区别,实则是置本质特征、功能作用于不顾,完全得了形式主义务虚的左倾弊病。突出表演效果成了唯一的技术标准,把“击与舞”(即打与练)完整统一的武术内涵给“肢解”,套路唯一形式,并以增进健康为由,认为格斗“技击”是违背体育增进健康思想的,因此抑制了

“击的方面”。所以,那时的武术“离搏击实战的本质属性越来越远”。^[13]这一时期对武术概念的基本认识只能是:“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传统体育。它具有强筋壮骨,增进健康,锻炼意志等作用;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项民族文化遗产。”^[14]直到1979年套路规则的修订,这种倾向才有所改善,形成了所谓“较为完善的技术体系”。其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自己的需要给群众体育贴上各种政治标签,忽而将群众体育作为政治运动,为路线斗争服务;忽而将群众体育作为政治指标,上纲上线,为“抓革命、促生产”服务;忽而以群众体育为政治橱窗,虚浮铺陈,粉饰太平。^[15]使程式化的、表现技击含义,只强调表演效果的和谐与“内外兼顾”的技术追求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都留有难以克服的“后遗症”。如60年代初相继创编的初级长拳套路系列、甲组长拳系列,起势的位置都是从右场练到左场,方向都是由面视前方转向左方,千篇一律,以此标榜“宁左不右”地紧跟领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时髦,甚至认为就是武术的“现代化”。可见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思想干扰破坏影响之深。

客观地说,在此并没有指责这种借鉴和移植的本身,而是谴责那种为政治目的虚浮铺陈,粉饰太平,任意篡改武术本质规律而搞起的形式主义“花拳绣腿”,急功近利、浮躁务虚蒙昧的做法。武术界深受其害,为清除这种恶习,我们更应该努力提高理性认识的能力,按武术的规律发展武术。汲取教训,以防这种错误悲剧的重演。再也不能杜撰“指定难度动作”,让观众说是“专家难度动作”^[16]了。

以上就是套路竞技形式创立之初,以违反自身规律依附错误政治的落后观念、单一的运动方式,为极端的政治目标服务结果造成的,就是因为武术过分强调“民族风格”的形式特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认识造成的。这样一来,淡化了武术的本质属性及特征,以至于造成套路和散手两种形式,使形式内容脱离了武术本质,产生了“打与练”分离的两个技术体系。其实,只有“打”才是它的唯一竞技形式。

6 改革开放后武术理性认识再次苏醒,却被顽固的极左形式主义思维惯性所禁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从政治上虽然无人再歧视张轸、吴高明,给董守义恢复了名誉。但是张、吴的学术观点却至今没有提及和肯定,在当代武术的历史中,甚至连这段争论的记载都没有。从中可见当代武术界在忌讳和回避这一客观的历史存在,暴露出武术界某些要人对武术感性认识的偏好。这些恰恰是更新武术观念、形成科学理性认识,转变同一概念下两种不同甚至矛盾形式的主要阻力所在。

只是温力先生1987年在《试论武术运动的现状及发展》一文中重申“……历来习武的人都不把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绝然分开,往往兼而习之(即打练合一)。武术技击对抗性项目的开展是武术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11]对此理性认识的复苏,在1988年全国武术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作了这样

的处理；对开展武术套路和散手‘一体化’（即打练合一）竞赛的设想是可取的，但对目前提高武术竞赛的技术水平（即为保持中国在武术竞技中的优势）不利，故不宜在高水平运动队中实施，但可在基层训练中广泛试用。^[17]以保证国家金牌数量优势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武术沿自身规律发展的良好趋势，就如此随意武断地给否决了。为了继续坚持“生物武术观（为健身而健身），保持‘中国领先地位’的梦幻不被马上击破，武术仍沿着“击”与“舞”分离的错误方向发展。因为在“舞”的方面中国有近40年畸形技术发展，能多拿金牌。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国际武术比赛也成了中国人与中国人比赛的不正常局面出现。尽管上层认为“可在基层训练中广泛试用”打练合一形式，但基层至今都未试用。

直到今天，武术界仍坚持着武术的认识仅停留于具体方式的研究；而从未能从整体上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反思。“这种肤浅的理论指导思想，继续异化着武术的本质，继续肢解着武术概念和功能。因此，申奥成功之后，原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强调武术要抓住2008年这一历史机遇；要处理散打与套路的兼容问题”；“要避免专家难度”；“要提高观众的认可度”；“要提高规则标准的客观性”；“要减少人为因素”。^[16]

7 结论与建议

随着中国社会全面与国际接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将向一切先进、优秀的，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学习。不仅学习先进的技术、高效的制度，同时也在不断更新固有的观念，这就突破了对待外来文化采取‘中体西用’观念的老框框。因此，武术观念更新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随着武术“散打王”职业赛制的发展，随着武术将要经过北京奥运会的筛检、改造，将会有力促进武术观念的彻底更新。

为此本研究建议，对当代武术的基本认识应确立在如下两点上。

（1）武术（或竞技武术）就是用于竞技的格斗，英语的含义就是“competitive fighting”。

（2）通过踢、打、摔等全面的格斗技术、技能的较量，以散打为竞技比赛形式，去掉技术得分差别，采用电子“点数”记分方法，增强评的客观性，以培养青少年勇于拼搏、敢于创新，进取向上的意志品质。套路只作为辅助练习内容。

这两点是构筑理性武术观念最基本内容，它摒弃了“体用”的观念区分，以追求精湛的搏击技术效果为目的。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逐渐建立起适应社会需要的全新武术观念。

注释：

① 生物体育观 既否定传统体育“身心同练”的一元思想，又肤浅片面地用一元论观点，将西方身心二元分离对抗的竞技体育，仅仅理解是运动起来，增加运动量的传统体育，它与传统养生术，二者最终的健身功能目的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 [1] 张宝琛. 学校应否废止兵操[A]. 近代体育文选[C].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52.
- [2] 胡绳.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80.
- [3] 何启君.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117, 129, 1344, 128.
- [4] 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A]. 近代体育文选[C].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2: 32.
- [5] 徐才. 武术学概论[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6: 12.
- [6] 张之江. 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宣言[A].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58.
- [7] 张之江. 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A]. 《体育史料·第16辑》, 90.
- [8] 徐元民. 张之江的体育思想之渊源[A].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体育思想之传播[C]. (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1999.
- [9] 武术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 364, 367, 373-374.
- [10] 张軫. 关于整理和开展武术运动的几个问题[J]. 新体育, 1954(9): 9.
- [11] 温力. 试论武术运动的现状及发展[J]. 体育科学, 1987: 14.
- [12] 李杰. 凝聚一刻, 光荣与梦想[J]. 北京: 中华武术, 2001: 9-4.
- [13] 于万岭. 试析武术套路与散手的‘分离’[J]. 体育科技, 1990(1): 13.
- [14] 体育学院本科讲义编写组. 武术[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1: 1.
- [15] 任海. 中国群众体育的历史回顾与基本经验[A]. 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C].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8: 22.
- [16] 魏纪中. 谈竞技武术进奥运[J]. 中华武术, 2001(9): 10-11.
- [17] 周荔裳. 群雄荟萃议武术定义及其它[J]. 中华武术, 1989(2): 3.

[编辑 邓星华]